

真理之爭二十年

孫長江

一 真理大討論的背景

今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已進行了二十個年頭，而這場歷史巨變，是從真理大討論啟動的。馬克思曾經講過：「由於某種判斷的盲目，甚至最傑出的人物也會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後來，到了一定的時候，人們就驚喜地發現，從前沒有看到的東西，現在到處都露出自己的痕迹。」^①用這段話來形容1978年的中國是很恰當的。當時毛澤東已去世一年多。許多擺在眼前的事物，人們卻因為精神麻木而看不見，可是，1978年一下子都顯露出來了。這些問題是：一、必須為1976年清明節人民聲討「四人幫」而被定性為反革命的所謂「天安門反革命事件」平反；二、推倒文革中的冤假錯案；三、鄧小平、陳雲盡快出來參加國家事務的領導工作；四、「四人幫」編造的一系列破壞國家、壓迫人民的所謂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的「理論」必須徹底批判；五、文化大革命必須重新評價。

然而，當時的主要領導人完全沒有這種歷史敏感。在粉碎「四人幫」問題上，華國鋒和汪東興立下功勞，但是，他們把粉碎「四人幫」的歷史意義，實質上降低為抓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個人，他們以為抓了這四個人以後，中國的頭等大事是迅速營造新偶像，用「英明領袖」替代「偉大領袖」，以填補毛澤東逝世後偶像崇拜的空缺。

1976年10月14日，中央同時宣布粉碎「四人幫」和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兩條重大消息。接着，在全國掀起了宣傳華國鋒的浪潮。個人崇拜的苗頭，已經顯著地突現出來。中共中央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發表社論，題為〈億萬人民的共同心願〉。社論說：「當前，我們要認真學習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學習毛主席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中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鄧，繼續反擊右傾翻案

1978年的中國，有許多擺在眼前的事物，人們卻因為精神麻木而看不見。這些問題是：一、必須為1976年被定性為反革命的所謂「天安門反革命事件」平反；二、推倒文革中的冤假錯案；三、鄧小平、陳雲盡快出來參加國家事務的領導工作；四、「四人幫」編造的一系列「理論」必須徹底批判；五、文化大革命必須重新評價。

風」，「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果實」。十幾天後，10月26日，「華國鋒向宣傳部門負責人說：當前一，要集中批『四人幫』，連帶批鄧；二，『四人幫』的路線是極右路線；三，凡是毛主席講過的、點過的都不要批評；四，天安門事件要避開不說」^②。很明顯，華國鋒選擇的是一條左的路線。但是，左的路線不僅違背全國人民的共同心願，也違背了歷史的發展潮流。

二 「兩個凡是」與毛澤東晚年的錯誤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發表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提出了著名的「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是四個月前華國鋒的指示的進一步規範化。「兩個凡是」經過秀才們的加工，用中共中央機關報刊發表社論的形式作為全黨全國的工作方針向全國人民宣示。第二天，2月8日，發出關於「堅決打擊政治謠言」的《通知》，它強調：「散布政治謠言」、「嚴重歪曲和損害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光輝形象」、「分裂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是「國內外階級敵人在新的形勢下向我們黨進攻的手段」。華國鋒、汪東興反覆強調，批判「四人幫」，要劃清「四人幫」和毛主席的界線，不能藉批「四人幫」批毛主席。

這樣一來，中國政治形勢陷入十分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人們強烈要求徹底批判「四人幫」的罪惡，但是，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的決定正是毛澤東批准的，有的甚至是他親自發動的。因此，要徹底批判「四人幫」，必須認真嚴肅地正視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或者因為批判「四人幫」而全然否定毛澤東，或者把「維護毛主席的形象」當作保護「四人幫」的大紅傘。張春橋寫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和姚文元寫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這兩篇論證和宣揚左傾路線的大塊理論文章，都曾發表在黨中央機關刊物《紅旗》上面。當《紅旗》雜誌社向汪東興請示要批判這些文章時，汪東興的批覆是：「這兩篇文章是經中央和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看過的，不能點名批判。」他反覆強調「文化大革命成績是主要的，是毛主席肯定的」。汪東興到山東視察時甚至說：「不能批『四人幫』把毛主席也批了。」

為了解決毛澤東和「四人幫」混淆不清的問題，鄧小平提出了「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的概念。本來，這個概念也可以包含「毛澤東思想應排除毛澤東個人的錯誤」這個意思在內，但是，當時沒有道破毛澤東也會犯錯誤，沒有提出毛晚年犯了嚴重錯誤這個要害問題；這導致堅持「兩個凡是」的人表面上也能接受這個提法。在華國鋒作的中共十一大政治報告中，一方面宣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同時又把粉碎「四人幫」說成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又一個偉大勝利」。他指出，指導文化大革命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當代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成果。

張春橋、姚文元曾在黨中央機關刊物《紅旗》上面發表宣揚左傾路線的大塊理論文章。當《紅旗》雜誌社向汪東興請示要批判這些文章時，汪東興的批覆是：「這兩篇文章是經中央和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看過的，不能點名批判。」他反覆強調「文化大革命成績是主要的，是毛主席肯定的」。汪東興到山東視察時甚至說：「不能批『四人幫』把毛主席也批了。」

耐人尋味的是，這個報告特別表明毛澤東是「完整地創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號召全黨「完整地、準確地領會和掌握繼續革命理論」。這樣，問題馬上發生了。準確地、完整地理解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不是就可以指導全黨全國人民把我們的事業推向前進呢？事實已經說明，這個理論以及在其指導下發動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國家和民族帶來了深重災難。擺在眼前的現實十分明確，要真正劃清毛澤東和「四人幫」的界線，必須面對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必須重新討論真理標準。

三 真理標準的提出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刊登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5月11日在《光明日報》公開發表，署名「本報特約評論員」。5月12日，新華社發通稿，《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全文登載，在全國造成很大影響。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公開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當天晚上，《人民日報》原總編吳冷西就嚴厲批評當時的《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吳指責：「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錯誤。」作者「是要提倡我們去懷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澤東思想，很明顯，作者的意圖就是砍旗」。完全出於作者意料，這樣一篇看來是陳述一個基本常識的文章，竟然引來軒然大波。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標題中，重點是「唯一」兩個字。文章指明，一切理論的真理性都必需經過檢驗；檢驗真理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是社會實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任何理論，包括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些作為指導思想的理論，不僅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且它們本身的真理性也需要經過實踐的檢驗。

完全出於作者意料，這樣一篇看來是陳述一個基本常識的文章，竟然引來軒然大波。文章剛剛被《人民日報》轉載，當天晚上，《人民日報》原總編、毛澤東著作編纂委員會辦公室前主任吳冷西先生就打來電話，嚴厲批評當時的《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吳冷西指責：「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錯誤。理論上是錯誤的，政治上問題更大，很壞、很壞。」作者「是要提倡我們去懷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澤東思想，認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確的地方，認為不能把毛主席指示當優化的教條，不能當聖經去崇拜，很明顯，作者的意圖就是砍旗」。第二天（5月13日），《紅旗》前總編也打電話嚴厲指責新華社社長：「新華社轉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轉發了一篇錯誤的文章。」這位《紅旗》原總編還對別人說：「《光明日報》這篇文章，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在思想上是反動的。」

接連幾天中，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央副主席指責：「〈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是針對毛主席來的」；《紅旗》雜誌社總編輯指責：「有些人抓住實踐和真理的問題大作文章，到底是要幹甚麼？」「現在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不是要強調發展和創新，這裏有個維護毛主席旗幟的問題。」

中央宣傳部長則去全國各省文教書記和宣傳部長會上說，這篇文章「不要以為《人民日報》登了，新華社發了，就成了定論」。「毛主席生前對省市負責同志講，不論是從那裏來的東西，包括中央來的，都要用鼻子嗅一嗅，對不對不要隨風轉。」他還向參加會議的人員連連作揖，連連說道：「拜託！拜託！」



1978年12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圖），會上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時至今日，人們雖然不再提「兩個凡是」這個概念，然而，從中國的農村改革到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每走一步都受到巨大的抵抗，抵抗的思路、手法甚至語言都是「兩個凡是」精神的復活。

四 堅冰是怎樣打破的

針對「兩個凡是」的責難，鄧小平指出：「這些人『天天講毛澤東思想，都忘記了實事求是毛澤東思想的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還認為誰要是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③大約半年後，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中，鄧小平高度評價了真理標準討論的重大意義，認為這場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並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麼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④。

鄧小平的這個講話，代表中共中央對這場真理之爭所作的結論。按理說，這場討論是達到以明確結論而結束的。從表面上看，大家似乎都接受了這個結論，那些猛烈攻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人，也在各種場合檢討，承認自己「犯了錯誤」、「思想僵化」。但是，事實並沒有那麼簡單。「兩個凡是」的實質是，用神化毛澤東的手法，維護和堅持多年來形成的一條根深柢固的左的路線。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打破了「兩個凡是」設置的神化毛澤東的思想束縛，使中國走上一條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改革開放的路子，開闢了新的歷史時期。但是，「兩個凡是」維護的那條左的路線的影響依然十分強大。人們雖然不再提「兩個凡是」這個概念，然而，它的思想方法依然頑強地活着。改革開放每前進一步，都要受到巨大的抵抗，抵抗的思路、手法甚至語言都是「兩個凡是」精神的復活，只不過具體事例不一樣罷了。

中國的農村改革，從人民公社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再到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每走一步都有人強烈反對，反對的論據依然是毛主席說過「人民公社

從1978年到現在，國內所有的爭論實質上都是真理之爭的繼續。改革開放的觀點、理論來自實踐，理論在指導實踐的同時又接受實踐的檢驗，並且在實踐中不斷得到充實、發展、完善。二十年的歷史難道不是充分地表明了這一點嗎？

好」、「人民公社」是社會主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單幹」、是搞「資本主義」。可謂「辛辛苦苦二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可是實踐表明，從1958年開始搞起來的人民公社，搞了二十年，到1978年，農業生產率都低於1952年農業合作化之前的水平。而到1980年，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農作物收成比1979年增產3%到5%。在人民公社體制下，鳳陽縣48萬公社社員生產的糧食不能養自己，鳳陽農民出外要公飯是遠近聞名的。到1979年底，實行一年包產到戶的鳳陽農民賣給國家的糧食達4,450萬公斤。鄉鎮企業的興起更是如此。與「鄉鎮企業是發展資本主義的溫牀」、「僱工不得超八人」等說法成對比，實踐證明，鄉鎮企業對國民經濟的發展作出巨大貢獻，鄧小平高興地稱讚「鄉鎮企業異軍突起」。

城市改革開放遇到的抵制更加激烈。1979年開始試辦特區，有人強烈反對，指責特區除了那面飄揚的國旗是紅色的以外，其他都是白色的。他們所用的思維模式、語言表達仍然是：毛主席帶領我們搞「社會主義」，你們搞的是「資本主義」，等等。對這種論調的最有力駁斥，仍然是實踐檢驗：特區成為全國對外開放的窗口，特區成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發達的地區，特區成為改革開放的帶頭羊，成為人們嚮往的奮鬥之地、成材之鄉。

從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改變，鬥爭更是激烈。從1979年到1990年，鄧小平先後講了十次「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但市場經濟仍然遭到激烈批判。到1990年12月，北京某大報仍然發表文章抨擊「市場經濟，就是取消公有制，這就是說，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搞資本主義」。其思維方式、打棍子的模樣，和當年反對實踐標準的「砍旗論」如出一轍。這種情況甚至發生在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本身的評價之中。前不久召開的真理標準討論二十周年的活動，恐怕有一些看法不一定是實事求是的吧。

從1978年到現在，所有的爭論實質上都是真理之爭的繼續。改革開放的觀點、理論來自實踐，理論在指導實踐的同時又接受實踐的檢驗，並且在實踐中不斷得到充實、發展、完善。二十年的歷史難道不是充分地表明了這一點嗎？

註釋

- ①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頁366。
- ②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黨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③④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114；143。